

# 談重商主義的經濟思想

## 一、前言

林金朝

西元十六至十八世紀是近世經濟思想與產業制度的萌芽時代。雖然在這兩三世紀中尚深受中古思想的影響，但學者的思想及政治措施已大異於上古及中古之時。此時西歐諸國深信，金銀爲財富的標幟，而以貿易出超爲達成獲致財富的手段，故紛紛採用不同經濟政策，透過政府的管制，以圖國富的增加與國力的擴張，形式「重商主義」(Merchantilism)。這兩三世紀的重商時代乃是一個階梯，有此階梯而後有重農學派，經濟學始進入科學之林，有重農學派而後有亞丹斯密(Adam Smith)的學說，而後有今日西洋的經濟思想與政策。①所以重商主義是中古與今日經濟思想的承軸，其在經濟思想史上所佔的地位，甚爲重要。

重商主義不是一種學說，也不是一因、一人、一地、一國創造的制度，更不是有預立、有計劃、有系統構成的理論，而是適應時代潮流的集體創作。因革拉曼說：「重商主義、無論在思想方面或在事實方面，究竟創始於何人，這是常常發生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能有絕對的答案。用這樣的態度去觀察經濟事實，是自然發生於一般非科學的人們心中的，這種見解可以在西臘和拉丁的學者中見出。至於此主義所提示的政策，如我們已經說明的，乃由近世初葉歐洲各國的實在情形所引起。這種政策在十四、十五世紀已經實行了一部份，所以比它的一切學理基礎的說明和辯論更要早些。在十六世紀之初它便有龐大的勢力，查理第五(Charles V)採用這種政策，因爲他的榜樣，這種政策更佔優勢。亨利第八(Henry VIII)和伊利沙白(Elizabeth)都努力模仿這種政策。不久，諸國已加入一普遍競爭，各強國盡量施展它的政治和財政的勢力，以圖本國工商業之勝利。」②這段話已將重商主義的演進作概括的說明，可見重商主義的形成條件、原因複雜、不是單一的、純粹的思想和理論體系，而是從現實的政策執行中演變的制度，遂漸形成一種理論，所以重商主義者競相謀求財富，不知不覺中對這一經濟觀念之確立貢獻不小。

## 二、重商主義興起的原因

重商主義興起的原因很多，包括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各方面的因素，錯綜複雜，茲試分析說明之：

### (一) 民族國家的形成

西元一〇九五年起至一二七〇年止百餘年間，十字軍八次東征，改變了歐洲政治權力的結構。諸侯及騎士在戰爭中傷亡慘重，封建聯邦衰落，國王權力大增。又因戰爭的失利，教會威信喪失，教士權力削弱。各國組軍與外族接觸後，民族意識增強，民族國家的觀念逐漸發達。西元一四五五年至一四八六年間，有名的玫瑰戰爭，導致貴族勢力更爲衰微，強力的君主取代了昔日的領主，封建制度衰亡，民族國家逐漸形成。爲了維持國家的權力，必須強化國王的軍隊、國王之原有收入，不足以維持官員及軍隊的開支，所以充實國庫財政、促進社會財富，使國富兵強的經濟政策應用而生。

### (二) 馬可波羅遊記的導遊

馬可波羅於西元二九五年回到威尼斯後，其遊記中，盛讚中國的富庶繁榮，在十四十五世紀風行一時，使歐洲的精神領域擴大、眼光開闊。東方之富庶，誘發了歐洲人對於尋求金銀財寶的狂熱。再加上羅盤、觀象儀、航海圖等傳入歐洲後，使歐洲的航海技術大爲進步，導致十五六世紀，西歐各國之海上探險活動，因而發現新航路、新大陸，並激發西歐各國佔領殖民地，擴大商業活動範圍，揭開海權爭霸的序幕。「馬可波羅確實是近代西方強盜的嚮導」。

### (三) 文藝復興的引領

文藝復興使得古希臘羅馬的學術思想帶進西方人的腦海，歐洲思想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人文主義是其特徵。人文主義注重世界人類的幸福，以人群快樂與文化爲其直接目標。知識的覺醒促使思想的革新、領悟「人」的價值，重視現實生活及物質幸福的增進。

### (四) 宗教改革的影響

基督教至十六世紀時，教會非常腐化，教會憑其特權、賣官鬻爵、結黨營私、干涉政治、擁地拒稅，不但各國國王急思沒收教產以利國，教士亦發難提倡宗教改革。新教主義皆傾向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與責任觀念，幫助財產權和契約權之發達。同時新教徒的思想，承認強盛的國家，因此國家的政治與經濟逐漸合而爲一了。

### (五) 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由上所述的這些因素，使得歐洲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化，是重商主義形成的直接因素。在社會結構中，最主要表現的形

式，是教士、貴族、市民三大階級地位的變化，也就是權力結構的變化。在經濟結構中，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鄉村、城市兩大經濟類型的變化，也就是經濟結構的變化。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交織的變化，使重商主義降生。中世紀後期的歐洲社會，由於十字軍東征，提高貴族社會地位、教士權力被削弱。玫瑰戰爭又使得貴族勢力衰微。君權終於取代了神權，使得政治統一，奠定了經濟統一的基礎。經濟結構的變化，第一是城市經濟取代了鄉村經濟，第二是農民轉化為市民。城市的復興，意味著商業的活躍。於是君主、城市、商業結合為一，重商主義於焉興起。<sup>④</sup>

### 三、重商主義演進的階段

重商主義早期，視金銀財寶為永久性的財富，限制金銀輸出。後期重商主義，視貿易順差為吸進財富的手段，不限制金銀輸出。前者以西班牙為代表，後者以英法為代表。

十六世紀初，西班牙、葡萄牙已佔有不少殖民地，從所佔中南美殖民地運回大量貴重金銀後，即嚴禁輸出。認為金銀是國家財富的標幟，亦即國力的泉源。政府多盡量提高關稅，限制外國商品輸入以防止金銀外流。採行補助津貼，各種獎勵方法增進本國商品輸出，以換取金銀。

十七世紀中葉，英國為了限制金銀輸出，先後頒布「使用條例」，規定在英國之外商，應將其售貨價款購買英國商品，「交易差額法」，約束本國商人將其外貿部份售款攜回英國。設立「皇家外匯管理局」，規定外幣向該局兌換本國貨幣。

在這一階段中，以禁止金銀輸出作為保留國內貨幣的手段，「貨幣平衡」的重金主義為此時期的中心思想。<sup>⑤</sup>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英法諸國以發展對外貿易、爭取貿易順差為獲至財富的主要手段，不再嚴限金銀輸出。注意發展製造業，鼓勵出口、爭取順差，演進結果，造成英式之商業型、法式之工業型、德式之財政型等，但其重商主義的思想概念並無二致。

在這一階段中，以貿易順差為爭取財富的手段，認為對外貿易所吸進之貨幣，應多於用出去之貨幣，「貿易平衡」為其中思想。<sup>⑥</sup>

### 四、重商主義的重要理論

重商主義的理論實不易論述，但其表現的結構形式，實以國家主義爲其核心。「朕即國家」，國家高於一切，爲使國家強大，無不實施重商政策，藉以發展國勢，故增強國家權勢是目的，增加財富是達成目的的手段。所以希求國勢的擴張，企圖國家經濟的發展，重視金銀爲財富的淵源，爲求貴金屬的增加而崇尚國際貿易，爲究通商政策之得失而計較貿易差額，實爲理論之大者，茲歸納簡述之：

### (一)人口論

人口衆多是強國必備條件之一，一國的人口之生長愈速愈多則愈好，因爲兵力與人口成正比例，並且人口之速增，即是勞工供給量之速增，這對於低廉之工資是必要的。

國家必須保護對外貿易，才能使對外貿易發達。國家爲了保護對外貿易，必須有強大的艦隊。軍艦需要水手，水手可當軍人、工人、商人。海軍及海事人員的來源，海上運輸之擴大，皆有賴人口之增殖，人口之速增可增加國家生產力與戰時國防力。

勞動力爲生產之根源。手工藝工場、商業、海事運輸業者，必藉人口增殖以達到勞動力之增加，使工資降低，減輕生產成本，增強輸出商品的競爭力，而獲致國際貿易之「順差」。

### (二)貨幣論

金銀爲一國通貨之基礎，貨幣爲國家最重要之財富，貨幣與金銀可互相調節，當市場貨幣缺乏時，生金銀改鑄爲貨幣，生金銀缺乏時，則鑄化貨幣爲金銀。金銀本身不易耗損，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社會公認以金銀爲財富，而作爲交易之媒介。是以重商主義者認爲，如國要一國經濟繁榮，必須先使其國擁有豐富的金銀。金銀如此被重視，但西歐諸國除西班牙外都缺乏金銀礦產，所以必須賴國外貿易以輸入金銀。通商貿易之目的，不在取得一般之商品財富，而在取得特殊形式之財富，亦即金銀與珠寶。

### (三)貿易論

重商主義者，將一般人經商時，希望個人所付出的款項，能少於其所收入款項的原則，應用於整個國家。認爲如果要使一國所保有之金銀增加，則唯有鼓勵輸出，限制輸入，以保持超優勢。重商主義者稱此國際貿易上的出超爲「貿易上的順差」，如果輸入超過輸出則爲「貿易上的逆差」。所謂「順」與「逆」就代表他們對整個國際貿易的基本看法。所謂「順」就是對本國有利，所謂「逆」就是對本國不利。

輸入商品數量及價值大於所輸入商品數量及價值，二者差額爲「出超額」。出超額大則金銀流入多，流出少，國家所保有

金銀數量必然增加，則國家富強，如果一國之對外貿易，其輸出不能超越輸入值，則貿易額雖大，亦不能算是有利。政府政策指導本國商人爭取「貿易上的順差」，使他國金銀流入國內，是重商主義經濟思想的核心所在。<sup>⑨</sup>

## 五、重商主義者及其經濟思想

### (一) 托瑪士孟 (Thomas mun, 1571-1641)

托瑪士孟是英國商人，曾任東印度公司理事，是重商主義「國外貿易至上論」的發言人。他反對禁止貨幣輸出，主張積極性的對外貿易。由於重金主義的意見反映到對「東印度公司」貿易政策的評估，他提出有名的「論英國的東印度貿易」、「一六二八年東印度公司向國會下院的請願與申述」、「英國的財寶來自國外貿易」三大論文來答辯。在此三論文中，「貿易差額」的觀念，完全表達出來。

托瑪士孟的「貿易差額」說，認為國外貿易差額是獲得財寶的唯一手段，是財寶增減的唯一衡量尺度。如果每年由英國輸出的商品，其價值大於英國所消費的外國商品，則為順差，金銀將流入國內，則財寶增加，反之，則為逆差，金銀流向國外，則國家趨於貧窮。

他反對限制金銀出口，一則因為貿易上的逆差，國內無法阻遏金銀的輸出，一則如果國內保有過量的金銀，幣值一定會下跌物價則上漲，將導致輸出的減少而輸入則增加，於是金銀仍將外流。

托瑪士孟認為貨幣係「貿易的靈魂」，足以助長國家的強盛與發展。唯有由於對外貿易上的順差所引進的財寶，始能成為國家富裕的貨幣，但須仍投資於自然財富及人為財富中，經常善加運用，以從事於再生產。

托瑪士孟贊成貨幣借貸取息，貸款可以使缺乏貨幣的人得以從事商業活動。利率的高低是工商業興衰的結果，工商業發達，市場需要貨幣流通，求過於供，則利率必高，反之，則利率低。

對於租稅的徵收，他認為以不妨害國民經濟為原則，如果因徵稅而使國民生活必需品價格提高，則平均工資亦應成正比例的增加。

### (二) 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 1623-1687)

威廉配第是後期重商主義經濟學家，在經濟思想史上，他的「政治算術」「貨幣小論」「租稅貢納論」「愛爾蘭政治剖視」諸書最為知名。他的思想無疑受到托瑪士孟和霍布斯學說的影響，而荷蘭工商業並重的模型，也給他一定的刺激。因為

荷蘭重商主義的形式與西班牙重商主義的形式不同，托瑪士孟以西班牙的貿易形式作為模擬的對象，威廉第以荷蘭工業與貿易形式，作為模擬的標本，前者以國外貿易為主體，後者以國外貿易兼顧工業發展為主體，這也就是重商主義前期與後期思想的分別所在。<sup>⑩</sup>

配第區分商品的價格為「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市場價格的起伏受到自然價格的影響，自然價格是由商品中包含之勞動量所決定，這就是「勞動價值說」的根源。勞動量是商品的「相對價值」，以貨幣表現即是「相對價格」；也就是商品的「交換價值」，而非「價值」。任何物品的評價，都可以土地與勞動為自然的分母來通約之，即一定數量的「天工」的價值加一定數量的「人工」的價值。勞動是價值的內在尺度，貨幣是價值內在尺度的外現型態，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勞動價值」得之於其所生產之物，決定於成人平均每日所需的生活資料（生活費用），又成為「費用價值稅」之源。

對於土地自然價格的研究，是他的地租論。他認為地租是一定期一定土地面積上的總生產物，「扣下穀種及消費的東西」，「其餘額便形成這一年的自然的真正的地租」。這個「餘額」含有一定的勞動量，它與貨幣中含有的勞動量比較，就是地租的貨幣價格，也就是相等的自然價值。於是，土地自由買賣的自然價值，「不過是使用權的自然價值」。而一塊土地的年租價值，是三代共同生活年數的平均數——二十一年。土地的價值，等於預買一定年數的地租。地租有差別，是由於「強烈的穀物需要，提高穀物價格」、「土地的肥瘠」、「生產技術」、「距離的遠近」的原故。配第是最早提出「差額地租說」的人。

從土地的貨幣地租引出利息，他認為每個貨幣的所有者都有權將貨幣購買出產收益的土地，以獲取地租。因此，貨幣應該跟地租一樣能產生收益，是為利息。利息是對於不能隨時收回借款權利限制的補償。利息的高低決定於貨幣的供給與需求，而以法律限制其利率，毫無意義。

配第認為推動一國商業所必需的貨幣，是有一定的數量或比率的，多於或少於這個數量，都會有損害的。為避免通貨膨脹，貨幣數量過多時，可溶為商品或放債生息。一國鑄幣，應具有同等價值，方能自由流通，無須法令禁止輸出。

對於賦稅的討論，配第積極贊成人民應以財產一部份收益轉給政府，因為貨幣資金可促進國家工商業的發達，民受其惠，無異取諸於民還諸於民。人民納稅的多寡，以其財產及其在公共秩序中所享利益而定。至於關稅政策之目的，是在管理貿易與限制消費。出口稅率之高度，以加諸輸出品成本後，其價格仍低於國際市場之價格為準。稅率並應取多選擇方法。外國商品之能在國內自製者，應提高其進口稅率，使其售價高於國內之製品，用以保護國內產業之發展。

### (三) 約翰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

洛克是英國政治哲學家，但在經濟學上亦貢獻很多，他著有「論減低利息與提高貨幣價值之後果」及「政府論」。其思想不但

影響當時執政者，而且爲後世經學家開拓新途徑。

洛克重視自然秩序，他認爲在原始狀態社會中，自然法約束人類行爲。人類生來時自由、平等、獨立的。各人享有生命、自由、產業等自然權利，每個人的生命、自由、產業，是其個人的財產，對於這種財產，除他本人外，別人決不會有任何權利。勞動者的自然權利，是從自然界中各取所需，勞動產生勞動生產品的所有權。自然界所生產的一切，成爲勞動者的私有財產，所以勞動是私有財產的基礎。

貨幣之所以重要是由於其物質上的耐久性，可以長久保存不致損毀，並且由於相互間的承諾，人們都願意取得貨幣，以交換那些真正有用而易於毀損的生活維護品，由於土地分配不均而產生地租，因貨幣分配不均而產生利息，兩者性質相同。貨幣的價值決定於其所含金銀量，洛克反對「劣幣驅逐良幣」，主張把分量不足的鑄幣從市場流通中收回，發行足量鑄幣，重建國家威信，不計國庫損失。<sup>①</sup>

柯爾貝特 (Jean 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

柯爾貝特是法國重商主義政策的主要實行者，法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在位1643-1715) 的財政大臣，於一六六一年主政，以「振興財經、充裕國庫」爲目標，積極發展工業生產，導致金銀流入。

柯爾貝特爲了打破荷蘭人在商業，海運的壟斷，運用保護貿易手段，關閉法境荷蘭貿易市場，禁絕荷船航行領海，對法航運及出口公司訂立獎勵辦法。採行保護關稅，禁止國內能生產之外國商品輸入。

爲配合對外貿易，給予工廠特許權及獨佔權。對於毛地氈、玻璃、鋼鐵及奢侈工業，給予優惠條件。聘外籍技術人員，引進外國技術，增加手工業工場，限制技術工人出境。嚴格實施產品品質管制。統制糧價，禁止小麥輸出、抑制工資、減低商品價格，以利輸出。

從科爾貝特的信札、訓令及其他文件中，可以發現對於重商主義的各種特點的闡發與辯護，他比英國的重商主義者更完備的反映國家主義的原則以及國家對於工業的關係。<sup>②</sup>

(五) 孟克利汀 (Antoine de Montchretien, 1576-1621)

孟克利汀是法國經濟學者，先於柯爾貝特的重商主義者，於一六一五年出版「政治經濟學概論」(Traité de l'économie Politique)，論證國王有發展工商業與航海業的義務，主張差額貿易，重視工業發展及經濟活動的利己行爲，可說是後期重商主義的典型代表作。

孟克利汀認爲財富不僅是貨幣，人民勞動所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豐富，同樣構成財富。他以爲發展工業是國家政策目標，爲

促進國內工業興起，應提高原料出口稅，禁止外來精製品輸入，獎勵銅鐵、羊毛、絲織、皮革等工業之生產。他認為，假若全國人民勤奮勞動，必能自給自足，並維持高度生活水準。確保全民必需品的足夠數量，是國家主要工作，謀求人民經濟福利是國家的義務。

雖然孟克利汀並沒有別出心裁的思想，有時他的觀念甚且超過重商主義或與重商主義相反，然大概說來，他是重商主義者，而且他的論述，較之其他人更有系統，更形完備。<sup>(13)</sup>

## 六、結 語

由以上討論，可明瞭重商主義的學說，很難加以概括敘述。總括此種重商主義思想，實著重於(一)稠密的人口(二)一國錢幣的數量(三)國外貿易(四)製造業(五)國家。

對於重商主義的一、二方面下批評很容易。把重商主義當作一種普遍適用的經濟政策看，也很容易明白他的缺點。但以重商主義盛行的時代背景來考慮他的問題，就不易挑剔這制度的缺失。重商主義在歐洲文化史上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不特有助於英、法、德諸大國的建立，而且是十六七世紀經濟發展最有效率的方法，對於經濟問題的探討，給以一種刺激，對於經濟學的發展有重大貢獻。直到現在，各國的經濟政策仍受影響，這可以從各國重視藏金、關稅政策、進口貨設限與匯兌限制等，可得到證明，所以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現在，可說是凱因斯式的新重商主義時期。<sup>(14)</sup>

### 註 釋

- ① 臧啓共譯「經濟思想史」P. 80
- ② 侯立朝著「世界經濟思想史」上冊P. 361
- ③ 同前書 P. 374
- ④ 同前書 P. 375
- ⑤ 同前書 P. 366
- ⑥ 同⑤
- ⑦ 參閱威廉史考特著「經濟思想史」P. 14
- ⑧ 侯立朝著「世界經濟思想史」上冊 P. 368
- ⑨ 同前書 P. 370
- ⑩ 同前書 P. 388
- ⑪ 參閱侯立朝著「世界經濟思想史」上冊P. 392
- ⑫ 威廉史本特著「經濟思想史」P. 18
- ⑬ 同⑫
- ⑭ 同⑬